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東塾讀書記

〔清〕陳澧 著 鍾旭元

魏達純 校點

陸氏書堂銅信云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指占書也
教人主順為何而君督促收捕既而達官獲免
疾竟棄教之初或以方伎交通官宦帝心頗訝
或第牢修因上書誣告曹等於是天子震怒下
捕黨人 陸氏為教之宗徒以風角者大初之
術教之宗不可為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東塾讀書記

〔清〕陳澧 著 鍾旭元 魏達純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塾讀書記/(清)陳澧著;鍾旭元 魏達純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7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ISBN 978-7-5325-6512-2

I. ①東… II. ①陳… ②鍾… ③魏… III. ①陳澧
(1810~1882)—文集 IV. ①Z4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 120525 號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東塾讀書記

[清] 陳 澧 著

鍾旭元 魏達純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3.375 插頁 6 字數 270,000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300

ISBN 978-7-5325-6512-2

G·560 定價: 4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陳澧先生畫像

漢初教

此條已抄入
易知錄
內此以指條
下為此

初教

〇〇最要

後漢書堂錮傳云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指占者教遂教子
教人李膺為河內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念懷憤
疾竟棄教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心頗評考作其
成弟牟修因上書誣告膺等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
捕黨人漢時為初教之子終以風角者大初之端甚矣
初教之子不為也

後漢書初教之子初教漢儒為然字景溫云近世大儒
於初教家無不考證而樂道之者初教此風至今日猶然
又初教漢儒曰之類初教之類初教之類

已動

《東塾讀書記》手稿

前言

一

陳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字蘭甫，一字蘭浦，世稱東塾先生，廣東番禺人，廣東近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曾經擔任當時廣東最高學府學海堂學長四十二年，特別是從一八六七年起，陳澧又受聘擔任菊坡精舍的山長，所以菊坡精舍受學海堂的影響最多。據陳澧《菊坡精舍記》說：「始議爲書院時，以書院多課時文，此當別爲課。澧既應聘，請如學海堂法，課以經史文筆。學海堂一歲四課，精舍一歲三十課，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課期諸生來聽講，澧既命題而講之，遂講讀書之法，取顧亭林說，大書『行己有耻，博學於文』二語揭於前軒，吾不自立說也。」可知菊坡精舍在辦學宗旨上是承傳了學海堂的實學宗旨，不以科舉應試爲目的的。陳澧因爲自身深受二十年的科舉之害，最後轉爲推崇顧炎武，以爲在經史中可以求得微言大義，通經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實學，主張摒棄當時以科舉爲主導的教學方式，認爲菊坡精舍門人

當以學問爲重，不是爲取超等；士人爲學，須於經、史、子、集四科當中，揀選一科與其性情相近的專門來研究，這與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專研一科的情況又相類似。所以無論是在教學宗旨還是教學內容上，菊坡精舍都既是效法學海堂而又有所創新的。

陳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經史題進行考課，還升堂講學，每次聽講者達數十人，既有針對命題的內容，又連帶及讀書之法。因爲菊坡精舍是院長制，不同於學海堂的學長制，這樣，菊坡精舍就成了陳澧一人的專門講學之所，陳澧便能够通過講學，詳細而系統地將自己的讀書方法、治學途徑、經驗教訓等傳授給學生，對學生的影響更深。所以陳澧與應課生徒的師生關係要比學海堂的更爲明晰密切，這些學生有一樣的師承，學術既高，影響廣泛，相互之間的聯繫又密切，便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東塾學派」。這個學派的形成，表明廣東在學術上已經是自成系統，獨具特色，能與其他流派分庭抗禮，在全國學術界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兩廣總督張之洞即有「庶幾從此東塾學派流衍中原」之說。陳澧講學於粵數十年，弟子衆多，重要者如梁鼎芬、陳樹鏞、桂文燦、趙齊嬰、胡伯薊、陶福祥、汪兆鏞、徐灝、文廷式、于式枚、廖廷相等一大批。其中有學而優則仕的，如文廷式、于式枚、梁鼎芬、張其淦等。而再傳弟子胡漢民則成爲辛亥革命的重要成員，終於推翻清朝統治，開始了民主革命，大大超出了陳澧所盼望的改變現狀的夢想。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陳澧的學術影響一直持續到民國以後。

陳澧是很重視讀書也很講究讀書方法的。他最認同韓愈的讀書法，他舉例說：

昌黎《進學解》曰：「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也。……其吟六藝若何？則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也。其披百家若何？則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者，知其有醇乎醇者，有大醇小疵者也。其提要鉤玄若何？則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而著於篇也。^①

事實上，陳澧正是按照韓愈的讀書法來認真研讀古籍，從中鉤玄提要，強調和突出他希望引起讀者注意的地方。這是他的讀書心得，也是他極力要倡導的內容。他想以此來影響後人甚至改變社會。他說：

十年來著一子書，通論古今儒學得失，關乎世事盛衰，此平生志業所在。^②

那麼，這本書叫什麼名字呢？他在與交往了二十年的老朋友的信中坦言：

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於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爲空論，至於學術衰壞，關係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於書，名曰《學思錄》。……著成此書，生平志業亦粗畢矣。^③

「學思」顯然是取自《論語·爲政》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自己既「學」又「思」，既繼承前人傳統又有自己的深切體會。他說：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學，斷無他術也。是故《學記》一篇，乃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不由學，必不能化民成俗。^④

他認爲：

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大亂。^⑤

專習一經以治身心，吾之學如此而已。《學思錄》宗旨歸宿處。^⑥

並強調：

《學思錄》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此《學思錄》大指也。^⑦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⑧

爲什麼要改名呢？原來是他看到《宋元學案》錄葉適《習學記言》說：

「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我今不以「學思」名其書，庶不拾水心之牙慧也。^⑧

但陳澧又並非只提倡讀古書，他說：

少時不讀近代文集，今老矣，乃知其不可也。經書難讀，近代賢人君子之所言易讀易知，讀之易得其益，不可不讀也。^⑨

此外，陳澧寫作時所採用的語言也是值得指出的，他說：

若夫著述之體，切宜留意，宜潔淨，宜平實，簡而明，簡而不漏，詳而不支，不煩，學古而不襲古，有法而不囿於法，此則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詞章所可同日而語者。^⑩

十九世紀末廣東著名學者和藏書家徐信符在其《廣東藏書紀事詩》中對自己所收藏的陳澧著作如此評論說：

東塾於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樂律算術無不研究。其所藏書，四部悉備，無不有批評點校，何日起何日訖，所書評語，或硃或墨，皆莊重不苟。其版本佳者，則蓋「東塾書樓印」，或「蘭浦」，

或「陳澧」，難得孤本，則三印悉備。觀其手稿，又可知其治學方法，凡閱一書，取其精要語，命門人寫於別紙。通行之書，則直剪出之，始分某書，繼分某章、某句、某字，連綴爲一，然後下以己見，評其得失，如司法官搜集證據，然後據以定案。^⑫

陳澧自己則謙虛地說：

錢竹汀先生無經學書，僕竟似之。昔年亦有辨正注疏之作，欲鈔爲一篇，題曰「碎義」。此二字出《漢書·藝文志》，所謂學之大患也。此不可刻，但擇數篇入文集可矣。文集亦無好文章，不足傳。且看《學思錄》何如耳。^⑬

陳氏謙稱自己文集沒有可以傳世的好文章，但又說「且看《學思錄》何如耳」，足可看出實際上陳氏對這部書是寄寓着厚望的。

關於這部書的寫作宗旨，陳澧在給弟子胡伯蓊的一封信中又曾自比顧炎武的《日知錄》：

僕之爲此書也，以擬《日知錄》，足下所素知也。《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僕之書但論學術而已。僕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問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

數十年之後者也。^③

就形式而言，《日知錄》是札記體，《學思錄》（即後來的《東塾讀書記》）亦然。就內容來說，《日知錄》寄托着顧亭林一生的理想和希望，《學思錄》同樣是作者「平生志業所在」。亭林盼望「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陳澧也說自己的書「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這些都是兩者比較相像的地方。

不過，陳澧以《日知錄》相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自己亦想創作一部拯救時弊、轉變世風的作品。在這一點上，陳澧的視角和一般漢學家的確不同。亭林爲漢學開山，《日知錄》被尊爲清代考證學的典範。大多數漢學家都爲《日知錄》考證方法之完善、考證內容之精博所折服，他們常常把這部書作爲自己工作時仿效的範本。陳澧則不然，他所看重的主要不是《日知錄》的具體內容，而是這部書的批判意義，即對明代空疏學風的針砭和糾正。就具體內容而言，陳澧的《學思錄》和《日知錄》差別相當大。陳澧聲稱自己不願意效法《日知錄》的三分法，他的書只討論「經學」而不講「治法」和「博聞」。不講「治法」的原因是不敢妄談，因爲自己沒有實際的政治經驗。不講「博聞」則是因爲清儒講博聞已經講得太多（事實上，「博而無約」正是陳澧在書中反復批評的內容）。即便是「經學」部分，《學思錄》與《日知錄》也有明顯的不同：《日知錄》廣徵博引，詳釋經書中的各種典章制度、語詞概念，《學思錄》則只講微言大義，不作一字一詞之考訂。這些都說明，陳澧並打算把

《學思錄》也寫成像《日知錄》那樣的考證之作，他所期望的只是這本書能够像《日知錄》一樣，改變當時的學風，並為後世開啓新的法門。

陳澧另外有段話正好可以替此作個注腳：

《學思錄》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術治天下也。排王肅而尊鄭君者，欲救近時新說之弊也。排陸、王而尊朱子者，恐陸、王之學將復作也。著此書非儒生之業也，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也。^⑮

最有趣的還是上文中的這句話：「著此書非儒生之業也。」所以他以「風痺已久」的雙手「嚴定課程，並力撰述」，終於大致完成此書。

對於《東塾讀書記》的成就，現代著名學者錢穆曾作過精彩的評論：

東塾論漢學流弊，本已見旨於《讀書記》，然大率引而不發，婉約其辭，讀者或不識。其意乃寫之於未刊之遺稿。……蓋深識之士，彼既有意於挽風氣，砥流俗，而又往往不願顯為爭駁，以開門戶意氣無謂之爭，而惟求自出其成學立業之大，與一世以共見，而祈收默運潛移之效。此在實齋、東塾靡不然。^⑯

錢氏此論是否適合於章實齋，姑且不論，但的確符合陳澧的情況。這也有東塾的話可以作證：

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也。然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讀古人書，辨其參錯，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此學者之大病也，由失鄭氏家法故也。^①劉師培亦在《南北學派不同論》一文中說：「澧學鈎通漢宋，以爲漢儒不廢義理，宋儒兼精考證；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與摭拾之學相同。然抉擇至精，便於學童。」

王鳴盛也曾有近似的說法，故陳澧於《鄭學》卷引爲知己，特加表彰：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澧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②

以上論述，均可說明《東塾讀書記》的確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著作。

二

細論起來，我與陳澧還真有點淵源。我攻讀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生時的導師之一鍾旭元教授，就

是後來編輯出版十六卷本《東塾讀書記》的陳澧門生廖廷相的再傳弟子。鍾先生與撰寫《陳東塾先生年譜》的汪宗衍先生也是老朋友。鍾先生與東塾後人一直有書信來往，東塾後人也曾寄贈臺灣出版的東塾作品集給他。汪宗衍老先生還直接與我書信聯繫過，並贈我以臺灣出版的《陳澧詩詞集》等。因為受導師的影響，我自讀研究生起，就對陳澧頗感興趣，寫過有關研究文章。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我還有幸直接接觸到陳澧當年撰寫《東塾讀書記》時收集的第一手資料。那是一九八一年秋，我從當年《讀書》雜誌上的一篇介紹文章得知陳澧有一批手稿藏於雲南省圖書館，遂經恩師鍾旭元教授批准，向校研究生處申請到經費，於當年寒假期間赴昆明，從十二月六日開始用了整七天時間把當年滇軍將領廖行超駐軍廣東時購得的《東塾著稿》（這是雲南省圖書館為這批資料起的名字）一百五十小冊全部仔細閱讀並抄錄下來。原來這是陳澧為寫《東塾讀書記》所準備的原始資料，類似後代學者所作的卡片。封面有「廖行超印」和「昆明陳氏壽松堂藏書」、「陳松年」、「濠堂藏書」等印章。書的開本很小，與「文革」中流行的《毛主席語錄》大小差不多。每頁多則數十字，一小段；少則十幾個字，僅一句話。毛筆書寫，字體大小不一，大者如指肚，小者若蠅頭。字迹或楷或草，或半行半草。所抄錄的內容大多是古籍原文，然後加一句若干紅字寫的按語。每頁都用紅筆在旁邊標明當歸屬哪部分，或者標明應如何評價此段文字等。例如其中一頁是這樣的（標點為筆者所加）：

淺儒襲漢學（後面緊接紅字：「今漢學已衰，《學思錄》慎勿任貶之。」）

心力每浮躁

阮文達公題凌次仲較禮圖詩 四卷三 第十五葉

二語精極，近時所謂漢學者，襲耳，淺儒耳，浮躁二字尤抉出病痛，請以文達此二句贈漢學者。（後面緊接紅字：「《學思錄》引此二句勉學者爲真漢學，勿襲漢學而浮躁。」）

大多頁上都標注所抄內容應屬將來著作之類部，如「小學音韻」、「小學訓詁」、「《學思》義疏」、「《學思》唐疏」、「《學思》近儒」等。經查對，其中很多內容都已經被收入後來的《東塾讀書記》中。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陳澧寫作《東塾讀書記》是非常認真的，是下了大工夫的。陳澧的治學方法也直接影響了我，使我在讀研和以後的研究工作中都始終堅持這種從材料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的做法。因此可以說，陳澧對我影響是很大的，我對陳澧也是非常佩服、比較了解的。

研究生畢業留校工作後，也曾與鍾老合作撰寫過評論陳澧詩詞的文章發表在《華南師大學報》上。原「嶺南叢書」編委會確定由鍾旭元先生來整理《東塾讀書記》可謂正得其人。鍾老歷時十載，數易其稿，付出了許多心血。可是由於經費等諸方面的原因，此書始終未能付梓。這對鍾老來說，自然是辭世前留下之一大憾事。好在經過《陳澧集》主編黃國聲先生的不懈努力，事情終於有了轉機，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接受這部書稿。其時鍾老已辭世多年，於是我慨然答應師母的要求，義

不容辭地接手整理鍾老留下的一大堆遺稿。我早已細讀過《東塾讀書記》，碩士學位論文也是專門研究陳澧的，又通過汪宗衍先生及陳澧後人獲得不少有關陳澧的資料，更有從雲南抄回的東塾原始資料。我對鍾老的筆迹也很熟悉，因而整理起鍾老的手稿來較為便利。終於在二〇〇八年完成了鍾老的夙願，使此書問世了。對於我來說，能完成先師遺願，就感到很滿足了。現在又將出單行本，我就更感高興了。

三

鍾老最初整理本書時，採用的是清朝光緒年間的兩個版本：一是光緒十二年東塾先生門人梁鼎芬、陳樹鏞編的十五卷本。這時距陳澧去世僅四年，陳澧臨終遺命由陳樹鏞負責編輯他的著作，遺稿都由陳樹鏞保存，因此收錄應該是較為完整的。梁鼎芬和陳樹鏞都是譽滿嶺南的學者，對老師的著作自然是盡心盡力的了。第二種版本是光緒十八年門人廖廷相編成由菊坡精舍刻印的十六卷本。廖廷相也是陳澧很得意的弟子，曾歷任水陸師學堂總辦、惠濟義倉總理、南海保良局總理；他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廣東英俊之士，多出其門下。曾先後擔任金山書院、羊城書院、應元書院、廣雅書院山長，又任學海堂和菊坡精舍學長十餘年。他又精通版本目錄學，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開廣雅書局刊印羣籍，特地聘請廖廷相總司校集。《東塾讀書記》由他來再次整理印行，自然是